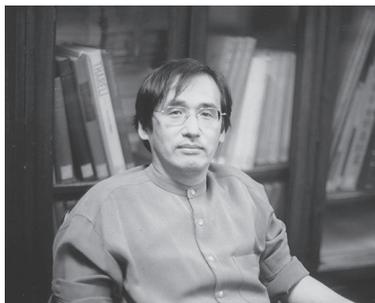


高田時雄教授之學問

主要學術成就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高田時雄先生投身以漢語為中心的語言史研究以及以敦煌寫本為中心的文獻研究，出版了大量重要研究成果，其學問之深湛、貢獻之卓著，在國內外有口皆碑。高田教授運用語言學和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國多個時代及地區記錄下的各種寫本及刊本資料，加以多重精密論證，不但明確了文獻記錄時期的語言狀況及其歷史背景的諸態，多年來還一直有新穎精辟的觀點持續問世。



簡單說是“漢語史”，但其中研究範圍卻極為廣泛。漢語擁有悠久的文字記錄傳統，它的歷史單以時間縱軸來追溯其發展已是十分困難，如果再以地域的多樣性為橫軸去探索研究的話就更為棘手。無論是傳世寫本還是出土資料，就算能解讀出其文字資料中記載的內容，但要想了解制作資料所使用的語言本身以及語言背後的社會背景則更是困難。既然任何語言都無法將個體的說話者與社會分割開來考慮，那我們就應當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與語言史有關的事實置于討論範圍之中。基于此種構想，高田教授運用各種資料，給我們精彩地構建了一段以人文社會的具體生活為背景的漢語史。下面簡單介紹高田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

高田教授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敦煌寫本的語言史。敦煌遺書中不僅有漢語，更包含了大量由各種語言寫就的寫本，如藏語、于闐語、回鶻語等。這些語言都曾經或多或少在敦煌周邊地區通行，是要闡明這些地區的語言社會具體特征極為寶貴的材料，但之前還很少有對這些語言相互之間密切聯系的研究，其原因自然在于開展此項研究不僅需要漢文文獻的讀解，還需通曉中亞地區各種語言。高田教授發揮其卓越的語學才能，從九、十世紀的敦煌是多語種社會這一觀點出發，在以漢文寫本為中心材料進行研究的同時也大量援引其他胡語寫本，總合性地逐

步推進了其語言社會諸態的發掘。

另外，敦煌寫本的文獻內容廣雜，除了漢文典籍之外，還有歷史文獻、佛教及其他宗教文獻、契約等世俗文書，以及所有與當時的學問和社會生活有關的文獻。因此，要解讀分析敦煌寫本，就需要擁有橫跨文獻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等多個領域的廣博知識。高田教授以主攻的語言史研究為中心，涉足諸多學問領域，統合各個領域知識，高識遠見，活用在過去的中國學研究中被認為是邊緣資料的胡語文獻，對於敦煌寫本及敦煌社會複雜的語言狀況提出新的見解和新的框架，構建了研究的大方向。高田教授在立足于東亞學問傳統的同時，對歐洲的文獻學和東方學亦是十分精通，這一研究手法催生了廣度與深度兼備的研究成果，開拓了前無古人的一片領域。高田教授研究的獨創性在於，他不但繼承了已臻細膩的傳統中國音韻學，而且在日本的東方史研究傳統基礎上，將歐洲文獻學、東方學的研究視角以極高水平融合在一起，正是這種研究手法使他開拓了一片別人無法企及的新天地。

■漢藏對音資料的研究

高田教授獨特的文獻語言學方法論對漢語史研究產生了很大的震撼，其中第一項研究，就是仔細推敲了在敦煌發現的以藏文記錄漢文讀音的一系列“漢藏對音資料”，分析了當時的語言狀況。作為此項研究的集大成問世的，就是其著作『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創文社，1988年）。該書是高田教授在學位申請論文的基礎上修訂潤色後付梓出版的，他不但重新詳細查閱並仔細核實了藏于倫敦和巴黎的敦煌文獻第一手資料，厘清了關於“漢藏對音資料”的過去所有研究，同時還加入新資料的解讀與分析，進行了全面的再度整理。該書以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方法為縱軸、以基于文獻研究的實證為橫軸展開，總合復原了敦煌地區九、十世紀河西方言的面貌，堪稱是一項劃時代的研究。

漢文文獻基本上是用漢字記錄的規範化書面語言，因此能明確傳達過去時代的漢語音韻、詞彙、語法的資料數量是出乎意料的少。在傳統的漢語音韻史研究中，主要運用的手法是：把用反切及注音整理劃分出的用字分合情況與《切韻》系韻書的韻類相對照，分析其歸並，同時使用外語中漢字借音資料作為推定音值

的輔助材料。高田教授不僅使用了敦煌文獻中漢文的注音資料，還詳細分析了用民族文字記錄的音譯資料，明確資料的分層，進行了復原敦煌地區九、十世紀河西方言音韻體系的嘗試。另外，他分析了藏語及于闐語的對譯會話例文集，闡明了當時口語語法的一部分。

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1933年）是一部研究漢藏對音資料的經典著作。但其中採用的資料有限，因此未能把握資料間的性質差異，並假設其與現代西北方言之間存在繼承關係，對二者進行了嘗試性比較。高田教授新增補了羅常培未能利用的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新資料，對合計14種漢藏對音資料進行校訂分析，甄別出了兩種語音系統：第一種以拉薩的唐蕃會盟碑碑文中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等對音為標尺，析出的音韻特徵距唐代長安音較為接近；第二種的顯著特徵是全濁聲母均有無聲化的現象，三等韻重紐 A、B 的區別歸並為 A，宕、梗攝的鼻音韻母消失等。

提出資料分層的此種見解在河西地區語言史上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在以敦煌為中心的河西地區，日常使用的原本是以漢語西北方言為基礎的語言，但唐代時首都長安的語言規範以強大的國家強制力進入河西地區，活躍在行政、教育、宗教等各個方面。然而後經吐蕃支配，該語言規範漸漸淡化，在實質上是獨立國家的歸義軍政權下，原有的當地語音代替長安規範上升到標準語的地位，資料中出現的分層正反應了這樣的語言歷史背景。在高田教授的闡述中，第一種資料本質上是唐代標準音的反映，而第二種則是歸義軍時期獲取權威地位的當地方言，因此他將後者命名為河西方言。此外，他還批評了先行研究將地區鎖定在西北方言，試圖找出古代河西方言和現在流通的同一地區現代方言之間共同點，而通過該著作論證可知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繼承關係。

基于精準的資料分析來闡釋河西地區語言史的動態，這種研究方法既新穎又具有說服力，不僅對漢語史產生了很大影響，對敦煌學及中亞語言史研究也影響頗深。昭和63（1988）年，『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一書獲得了第十六屆金田一京助博士紀念獎。

這項研究完成了現存大部分漢藏對音資料文本還原，但被稱作“長卷”的篇幅較長的音寫本尚未得到解讀。與在漢字旁邊用藏文標音的“音注本”不同，音寫本中只有用藏文記錄的發音，並未記載漢字。音寫本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就是原漢文文本的精確鑒定。這正如以用片假名記下日語讀音的佛典來還

原本來的漢文經文一樣，其中的困難超乎想像。“長卷”雖由西門華德（Walter Simon）進行了一部分的漢文鑒定，但還未能鑒定還原出文件全本的原文。高田教授對照『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中構擬的河西方言音韻系統以及所有漢藏對音資料的對音數據，廣泛搜索數量龐大的敦煌文獻，仔細收集分散各處的信息，終於證明了“長卷”不是單一經典，而是將幾種經典文本的部分拼合而成，並且鑒定出整個漢文文本，對字句的異同進行了詳盡的考證。這一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參看「チベット文字書寫「長卷」の研究（本文編）」（『東方學報』65冊，1993年）。

■回鶻字音的研究

高田教授的第二大研究主題是闡明中亞語言交流的實態。公元九世紀，被逐出蒙古高原的回鶻民族將活動根據地移至中亞的吐魯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鶻國（西州回鶻）。一直到明代伊斯蘭文化在這一地區逐漸滲透為止，這個王國長期保持了以佛教為中心的特色文化，即使在13世紀被蒙古征服後也不例外。當時的回鶻人一方面使用向粟特人借來的敘利亞系文字記錄自己的語言，一方面也繼承了吐蕃地區的漢字文化傳統。這樣一來，就與日本漢字音、朝鮮漢字音和越南漢字音的形成相仿，出現了回鶻獨特的漢字音，漢字發音為回鶻獨自的傳承音。高田教授通過「ウイグル字音考」（『東方學』第70輯，1985年）以及「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東方學報』第62冊，1990年）等一系列的研究，首次指出了回鶻字音的存在，並具體闡明了其本質。回鶻字音的特色在於，雖是以中國西北部的河西方言發音為基礎，但使其適應回鶻語的音韻系統，沒有聲調的區別，聲母和韻母也大大簡化。這項研究發表後，研究古代突厥語的學者也深受其啟發，發掘了與日本的漢字假名混合文類似的漢字回鶻文混合的文字資料，還闡明了與日本“文選讀法”類似的漢字音讀與訓讀並行的讀法的存在，可見高田教授的研究給相關領域的阿爾泰語言學及日本語言學帶來的影響是極大的。高田教授的論文「ウイグル字音考」及其相關研究闡明了傳至西域的漢字文獻及字音的種種實態，開拓了理解西域歷史和語言文化的新天地，因此受到極高的評價，並獲得昭和61年度（1986年）第五屆東方學會獎。

■于闐語及河西方言

用于闐語書寫的于闐文書是高田教授著眼的河西方言研究另一類重要資料。于闐在唐代是西域南道中的綠洲城邦，當時還沒有伊斯蘭化，盛行的是佛教。在能展示漢語與于闐語交流的資料中，由婆羅謎文字音寫的漢文《金剛經》是早已爲人所知的一種，『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中也將其用作相關資料。而高田教授由此更進一步，在「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年）中廣泛搜集並仔細查找了敦煌文獻中的于闐文書，提取于闐文中包含的地名、官職名和人名等漢語詞條，對其音韻進行分析。該論考是論證河西方言向中亞滲透的一大力作。

高田教授調查的于闐文書多達40件，從中抽出的漢語詞條達到了89條。高田教授對所有詞條都進行了詳盡的考證，推定其音寫的漢語詞條，同時還對照《金剛經》的音寫系統對這些漢語詞條進行了音韻學上的分析。分析結果證明，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詞條是以一種與音寫本金剛經相同的漢語方言爲基礎作成的。于闐文書是由不同時期多人執筆寫成的文獻，且其中出現的漢語詞條是曾經日常使用的詞語，這一事實可以佐證河西方言曾廣泛滲透至于闐地區。

■語言生活諸態的研究

高田教授在論述文化接觸方面也有諸多論考，闡明了和河西方言滲透有關的語言交流和多語言生活的本質。詳細論說敦煌狀況的著作有 *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Acta Asiatica* 78, 2000.)，以及中文版的〈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週年》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同樣關於吐魯番的狀況則在「漢字の西方波及」（『漢字文化三千年』臨川書店，2009年）中加以論述。以上兩篇著作是反應漢字文化向周邊地區滲透的總論，展示并描寫了語言交流的全貌。從文獻記錄出發再建其文獻記錄時期的語言生活，這一手法可以說是由高田教授獨領風騷，相關的一系列著作有：「五姓を説く敦煌資料」（『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14, 1991年）、〈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冊，1998年）、〈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新世

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敦煌的識字水平與藏文的使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敦煌的語言生活〉（劉進寶（編）《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高田教授從多種角度闡明了敦煌及中亞曾擁有的語言生活諸態，這一功績不可磨滅。

■音韻史料及中外交流文獻研究

高田教授研究的第三大基石，是針對由中國人自己著手進行的、也就是所謂的內部語言觀察記錄，以及西歐特別是傳教士留下的外部語言觀察記錄，採用東方和西方的文獻學手法進行精密考證，從言語學的觀點進行分析。前者的研究對象，從廣義上來說是佔據漢語音韻史研究主流位置的韻書和注音資料等，但高田教授的觀察角度則在於，對漢文文本中的文字或語彙的發音加以指定注音的中國人是在怎樣的語言體系中進行如此註釋的，由此展開揭示文字記錄背後語言實態的一系列研究。代表作有：「玉篇の敦煌本」（京都大學教養部『人文』33集、1987年）、「玉篇の敦煌本・補遺」（京都大學教養部『人文』35集、1989年）以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の言語と敦煌寫本の性格」（『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可洪隨函錄と行珣隨函音疏」（『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年）、〈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排字韻》劄記〉（《敦煌學》第二十五輯，2004年）等。

上面幾節中介紹了發表於『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之後的與敦煌語言史相關的主要論文，這些論文在譯為中文後以個人論文集形式出版，題為《敦煌・民族・語言》（中華書局，2005年）。通過該書可以一覽高田教授卓越的主要研究成就，在語言史領域之外這些成就也在中亞史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中廣泛流傳，得到了中外研究者的高度讚譽。

在研究西方人對漢語的觀察記錄方面，高田教授亦有根據表音文字記錄的中國語音闡明當時語言狀況的諸篇論考，發表的眾多研究成果包括：「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東方學報』72冊，2000年）、「カトリック・ミッションの言語戦略と中國」（『文學』隔月刊第2卷第5號，2001年）、「ジュゼッペ・ロスとロス文庫」（『文學』隔月刊第2卷第3號，2001年）、「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語の勝利」（『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年）、〈明末官話調值小

考》(《語言學論叢》第29輯, 2004年)、《廣州通紀》初探》(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 新史料與新問題》科學出版社, 2004年)、《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陳益源(編)《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第117輯, 2009年)。這一系列的研究分析了用表音文字記錄的西歐資料, 闡明從西方語言文化視點觀察的漢文背後隱藏的語言實態。高田教授憑藉通曉歐洲諸種語言的卓越語學能力以及對歐洲的學問和文獻學的深厚造詣, 從全新的視角重建了語言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這種高度是他人望塵莫及的。

■對共同研究和教育的貢獻

在對教育以及研究活動的貢獻方面, 高田教授也是功勳卓著。經昭和56(1981)年至58(1983)年於小樽商科大學任職后, 他於昭和58(1983)年開始任京都大學教養部副教授, 平成元(1989)年調至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 負責語言史研究部門, 平成9(1997)年升任教授。轉入人文科學研究所後, 高田教授在推進個人研究的同時還組織了共同研究班, 盡力深化研究交流、推動學術進展、培養研究後輩。

由高田教授組織運營長達二十多年的共同研究班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可以說是研究的中流砥柱。研究班的課題包括語言史和文獻學, 如漢語音韻史、與近代歐洲的語言接觸、與中亞的文化交流、敦煌學和寫本研究等, 每個課題下都集中了關西一帶的研究骨幹及青年研究者, 形成了語言交流史的研究據點。其成果一是總結為研究報告書, 如『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明清時代の音韻學』等; 二是自“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開辦以來, 將每年的研究成果以論文集『敦煌寫本研究年報』這一形式出版(至平成25年〈2013年〉度末為止共刊行8集), 將有關敦煌學和寫本學的共同研究最新成果刊行於世, 吸引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在歷代研究班中, 高田教授都充分發揮了作為共同研究組織者、運營者的指導能力, 在青年研究者的培養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為 COE 項目基地的領首

這裡需要大書特一筆的是，高田教授擔任京都大學21世紀 COE 項目“東亞世界人文信息學研究教育基地”（平成15（2003）年度～平成19（2007）年度）的負責人，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該項目以“爲了漢字文化的全面繼承與發展”爲主題，目標是圍繞其主題進行人文學、信息學方面的研究，包括漢字文化圈中漢字使用的現狀及其變遷、與漢字派生出的周邊文字的有機結合、處理這些文字的方法，並進一步進行與此相關的知識技術的教育。爲實現這些目標，該據點站組織了：（1）有關東亞文字的人文信息學方面的研究；（2）漢字文獻知識庫的構建；（3）東亞人文信息學人才培養項目。其成果現在以「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データベース」「CHISE」（Character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的形式，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設東亞人文信息學研究中心的網絡主頁上對外開放。另外，相關學術研討會也大量舉辦，其中作爲該項目的總結，2007年10月舉辦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漢字文化三千年」，廣泛公開了從作爲據點站的研究活動中獲得的最新見解。之後彙集的論文以高田時雄（編）『漢字文化三千年』（臨川書店，2009年）出版成冊。

■對學術界的貢獻

高田教授不僅在日本國內是東方學會、日本中國學會、日法東方學會等的會員，在國際上還擔任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長，在國內外的各個學會中積極進行研究報告；在敦煌學領域中作爲多個相關國際學會的主辦者，對該學術界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將其成果編著刊行的有：『草創期の敦煌學』（知泉書館，2002年）、《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涅瓦河邊談敦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年）等，這些成果都展示了敦煌學和文獻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向，在國際上廣受好評。同時，高田教授作爲海外學術雜誌的編輯委員也表現活躍，擔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機關雜誌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東方文獻遺產] 的海外編輯員，以及《中國語言學集刊》的編輯顧問等職務。

主要著作及論文目錄

下面將“主要學術成就”部份提及的高田時雄教授著作及主要論文整理成書目。* 記號下為各項成果的說明。

[專著]

1988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洋學叢書33）東京：創文社。

2005 《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

*前者利用由藏文記錄漢字音的“漢藏對音資料”以及相關音韻資料，刻畫了（古代）河西方言的面貌；後者從發表於『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之後的各類著作中，選取出與漢藏對音資料、回鶻字音、于闐語中的漢語詞條、音韻資料以及敦煌的語言生活相關的有代表性的精彩論著，譯為中文後以個人論文集形式結集出版。

[編著]

1994 『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編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1 『明清時代の音韻學』（編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2 『草創期の敦煌學』（編著）東京：知泉書館。

2007 《轉型期的敦煌學》（共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漢字文化三千年』（編著）京都：臨川書店。

*前兩冊是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班的研究報告書，中間兩冊是高田教授主辦的有關敦煌學方面的國際會議成果彙總。最後一冊是由高田教授擔任領首的 COE 項目總結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果。（除用中文編的《轉型期的敦煌學》外，其它均用日文）

2012 《涅瓦河邊談敦煌》*Talking about Dunhuang on the Riverside of the Neva.*（編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10年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舉辦的 Roundtable 論文集，其中收錄日本及俄羅斯與會者的 9 篇論文。（中文・英文）

[目錄・索引類]

1995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par Paul Pelliot*.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1997 *Supplément à l'Inventaire sommair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叢刊7.

2006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北京：中華書局。伯希和編；高田時雄校訂、補編。

* 第一冊是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是將伯希和所編的目錄校訂、增補所得（法文）；第二冊是高田教授自己彙編的補遺（法文）；第三冊是將正編和補編集合為一本出版的中文譯本。

1994 『法顯傳索引』（桑山正進と共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索引叢刊2.

1999 『西域行記索引叢刊 I 大唐西域記』（桑山正進と共編）京都：松香堂。

2000 『西域行記索引叢刊 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桑山正進と共編）京都：松香堂。

2002 『西域行記索引叢刊 III 洛陽伽藍記・法顯傳・釋迦方志』（桑山正進と共編）京都：松香堂。

* 以上諸作作為共同研究班研究成果的一部份製作而成，是佛教僧傳記、行記和西域相關的漢語文獻的一字索引。之後這些數據以“西域行記データベース”[西域行記數據庫] 的形式公佈在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網頁上，使學界廣受裨益。

2010 『陶湘叢書購入關連資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東方學資料叢刊17.

* 陶湘舊藏叢書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的漢籍的中心部份，而關於這些叢書是如何一併歸於原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本書使用倉石武二郎的書信以及外交史料館所藏有關東方文化事業的檔案資料，對其前後過程進行了詳細解說，同時公佈了相關資料。

[其它]

1990 『中國の諸言語』（共譯）東京：大修館書店。

* Robert Ramsey.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的日文譯本。該書為概述漢語和周邊的各種語言的有機性立體性傑出著作。

1996 『東洋學の系譜（歐米篇）』（編著）東京：大修館書店。

* 在東方學研究中留下了卓越功勳的現代歐洲碩學鴻儒24人的評傳。高田教授自身執筆其中的レミュザ（雷慕薩）和クラブロート（克拉普羅特）兩章。

2011 『小川環樹 中國語學講義』（編集）京都：臨川書店。

* 該書是中國語學概論，原為中國語學文學鴻儒小川環樹教授的中國語學講義，由尾崎雄二郎教授用充滿現場感的口吻忠實筆錄，高田教授以此記錄為基礎編輯成書後刊行。

[論文]

1975 「詩經の新古層辨別の一標準」『中國文學報』第25冊. pp.1-10.

* 論述詩經中押韻的入去聲通用的分佈可以作為判斷《詩經》各篇新古的標準。

1985 「ウイグル字音考」『東方學』70. pp.150-134.

* 通過對一些注音寫本進行音韻史學方面的考察，首次點明在以吐魯番盆地為根據地的古代回鶻王國中存在漢字音系統。

1987 Note sur le dialecte chinois de la région du Hexi 河西 aux IXe-Xe siècl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Numero 3. pp.93-102.

* 通過對用漢藏兩種語言書寫的會計出納賬簿進行語言學上的分析，闡述九、十世紀河西地區漢語方言的規範標準發生的變動。（法文）

1988 「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pp.71-127.

* 從于闐語的世俗文書中抽出來自漢語的人名、地名和官職名等，加以音韻史學的分析，點明這些詞基本上擁有和于闐婆羅謎文轉寫的『金剛經』同樣的音韻特徵。

1990 「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東方學報』京都62. pp.329-343.

* 說明回鶻漢字音的存在，其特徵呈示與日本的吳音、漢音、唐音的層次類似的時代演變。

1991 「五姓を説く敦煌資料」『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14. pp.249-268.

* 在敦煌遺書中，除了宅經類、具注曆、童蒙書、《切韻》刻本中可見有關五姓記載

之外，敦煌藏文文獻中也存有「人姓歸屬五音經」這一文獻，由此可知五姓說曾廣泛流傳於敦煌民間，連藏化的漢人社會中亦有五姓的運用。

- 1992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の言語と敦煌寫本の性格」『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pp.197-212.
- * 新羅僧慧超的印度行記『往五天竺國傳』的寫本留存在敦煌遺書中，本篇通過分析其中語言，並將其與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所引用的詞語進行比較，指出這一寫本是慧超的草稿本。
- 1993 「チベット文字書寫「長卷」の研究（本文編）」『東方學報』京都 65. pp.313-380.
- * 將用藏文轉寫的敦煌漢文文獻中規模最大的“長卷”文本全面還原成漢字對照，作為音韻史的研究資料。研究結果表明，書寫在表面的大部份是佛教教理問答類，背面文本則多為佛教頌歌。
- 1994 Bouddhisme chinois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Le Long Rouleau chinois et la communauté sino-tibétaine de Dunhuang. *Bouddhisme et cultures locales, Quelques cas de reciproques adaptations,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de septembre 1991*, EFEO, Paris. pp.137-144.
- * 從大英圖書館收藏的用藏文轉寫的漢文文獻之一“長卷”的寫本內容出發，推測有藏化的漢人社會之存在。（法文）
- 1994 「可洪隨函錄と行瑠隨函音疏」『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pp.109-156
- * 五代時期於北方誕生的佛經音義有可洪的《隨函錄》，而南方則有行瑠的《隨函音疏》。前者因高麗藏本而流傳至今，但後者已經失傳。本篇論文就這兩種音義仔細排查了包括敦煌本在內的今日可見的殘卷及佚文，對這兩種文獻在音義史上的價值作了定位。
- 1997 「清代官話の資料について」『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pp.771-784.
- * 解說清朝時期根據雍正的上諭陸續編纂的所謂〈正音書〉7種，並探討了清代官話的實態。
- 1998 〈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pp.183-190.
- * 敦煌社邑文書中用漢文書寫的文獻有不少為人所知，但本篇論文首次指出了亦有用藏文書寫的〈社條〉的存在。這一發現對證明敦煌存在使用藏語藏文的社會集團有重要的啟發作用。（中文）
- 2000 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Acta Asiatica*, 78. pp.49-70.

- * 查驗敦煌遺書中留存的胡語文獻的樣態，如粟特語、藏語、于闐語、回鶻語、梵語等等，論述敦煌多種語言並行使用的實態而實證其時代演變。(英文)
- 2000 「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東方學報』京都72. pp.754-740.
- * 西方人留下的研究粵語的資料不僅數量豐富，且反映時代的差異。本篇論文通過將西方人表音記錄與《分韻撮要》等本土韻書相比較，點明從19世紀至今，粵語的元音系統有了較大的轉變。
- 2001 「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語の勝利」『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pp.127-142.
- * 威妥瑪以編纂了第一部北京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而聞名。本篇論文則詳細闡述了清末的語言情況以及威妥瑪如何着眼於北京官話的整個過程，因其中描述出近代漢語發展動態，深受好評。
- 2001 〈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 pp.635-652.
- * 解讀與吐蕃統治敦煌末期進行的寫經事業相關的藏文文獻，論述寫經事業中運營實態的細節，如底本的借用、寫經紙張的供給方法、抄寫完的經卷的保存地點等等，並說明寫經人大部份是以“將”為單位從漢人部落徵集的。(中文)
- 2001 「ジュゼッペ・ロスとロス文庫」『文學』隔月刊第2卷第3號. pp.1-10.
- * 本篇論文根據豐富的歷史資料，追溯長期居住中國的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羅斯的一生，並細緻探索了他所搜集的藏書內容以及其最終去向。
- 2001 〈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pp.348-354.
- * 上述2000. 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的中文譯本。
- 2001 「カトリック・ミッションの言語戦略と中國」『文學』隔月刊第2卷第5號. pp.1-7.
- * 大航海時代以後，天主教各派的傳教活動擴展到世界各地，其中存在著周密計劃的語言戰略。本篇論述他們在與中國文明接觸時出現的局面，以及從他們的語言戰略中產生的與漢語有關的著作及其性質。
- 2002 「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pp.4-36.
- * 簡要介紹了漢學學者狩野直喜的生平和學問。
- 2002 「國際漢學の出現と漢學の變容」『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7號. pp.18-24.

- * 論述“漢學”這一詞和概念的演變，同時探討了近來以中國為中心逐漸重建的中國學同“國際漢學”之間的關係及其現狀。
- 2002 A Note on a 16th Century Manuscript of the “Chinese Alphabet” . Antonino Forte, Federico Masini (eds.) *A Life Journey to the East, Sinological Studies in Memory of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Kyoto :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pp.165–183.
- * 指出被認為是“中國的字母”而傳到梵蒂岡的寫本，實際上是識字課本“上大人”，並根據其音寫形式等特徵推論這一寫本是如何傳入歐洲的。(英文)
- 2003 〈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 pp.266–273.
- * 翻譯並介紹了記錄吐蕃時期在敦煌舉行受戒的三件文書，說明內容是關於九世紀30~40年代(吐蕃統治晚期)從康地前來的僧統主持施行的受戒記錄。(中文)
- 2003 「敦煌寫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學者のヨーロッパ訪書行」『佛教藝術』271號。 pp.21–32.
- * 過去曾有不少日本學者遠渡英法從事敦煌寫本的研究，本篇論文闡述其研究內容及其在研究史上的意義。
- 2004 〈《廣州通紀》初探〉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 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 p.281–287.
- * 指出冠名為《廣州通紀》的一篇寫本實際上是將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和黃衷的《海語》這三冊著作合書而作，得出結論在編寫時與天主教有關的記述都被仔細刪去，以便在鎖國時期的日本仍能流通。(中文)
- 2004 〈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 pp.13–27.
- * 斯坦因和伯希和從藏經洞帶走敦煌寫本後，清政府將餘下所有寫本送往北京。得知消息，京都文科大學五名教員立刻趕往北京進行調查，這一行動雖已為人所熟知，但本篇論文提供了新的見解，並詳細記述了事情始末。(中文)
- 2004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urfa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Qieyun Fragments.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pp.333–340.
- * 說明吐魯番發現的《切韻》殘片包括寫本和刊本兩種，並明確其各自在《切韻》系韻書發展中所佔的位置。特別指出了吐魯番發現的刊本切韻是比《廣韻》註解

更多的坊刻本。(英文)

- 2004 〈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排字韻》筭記〉《敦煌學》第25輯(潘重規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專輯). pp.303-310.
- * 本篇首次證實了在莫高窟北區發現的版心中有“排字勻”的一幅殘片是金代王文郁的『新刊韻略』, 消除了之前的誤解。(中文)
- 2004 〈近代日本之漢籍收藏與編目〉《2004年古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 輔仁大學出版. pp.1-26.
- * 敘述近代日本圖書館或個人漢籍收藏的歷史和現狀, 解說此類收藏的漢籍目錄的各自特點, 另外還涉及到展覽目錄、藏書家拍賣目錄和古書肆販賣目錄等各式目錄。(中文)
- 2004 〈明末官話調值小考〉《語言學論叢》第29輯. pp.145-150.
- * 梵蒂岡所藏一部“漢=拉丁文字典”寫本附載的“使用法”中有將官話聲調利用音樂的五線譜來描述的記錄。因據此記載復原明末官話調值。(中文)
- 2006 「玄應音義について」『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第1輯)解說冊.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 pp.1-8.
- * 說明玄應音義成立的來歷, 嘗試將其在中國佛經音義史上定位。
- 2006 A Note on the Lijiang Tibetan Inscription. *Asia Major*. Vol.19- 1/2, 2006. pp.161-170.
- * 解讀雲南麗江保存的唐代藏文碑文, 指出此碑是南詔國所作, 並論述其背後的民族關係。(英文)
- 2007 「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 pp.1-26.
- * 通過李滂和白堅兩位當事人, 解明了現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是如何遠渡日本的這一疑問, 彌補了之前研究的盲點, 是頗有意思的一篇論考。
- 2007 〈金楷理傳略〉《日本東方學》第1輯. 北京: 中華書局. pp.260-276.
- * 圍繞清末受聘的外國人金楷理(Karl Kreyer), 查閱美國的浸信會傳教檔案館中所藏檔案資料以及熱那亞的奇約索尼東方美術館中保存的金楷理個人藏書等資料, 首次釐清了其人生平。(中文)
- 2007 「非漢字から見た漢字文化」『月刊言語』第36卷第10號. pp.48-

55.

- * 介紹歷史上用漢字以外的文字記錄漢語的事例，如藏文、八思巴文字、羅馬字、阿拉伯文等，解說漢字的標語素的性質可以發揮克服方言之間的差異而統合中國社會的功效。
- 2007 〈敦煌的識字水平與藏文的使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pp.599-615.
 - * 將敦煌的漢字識字率相對較低這一事實納入考慮的同時，舉出具體資料論述漢人居民學習直至實際使用藏文的過程。（中文）
- 2008 「李滂と白堅（補遺）」『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2號． pp.185-190.
 - * 採用最新資料對上述2007「李滂と白堅」一文加以補充。
- 2008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に關する一問題——玄奘と長命婆羅門」『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2007』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 pp.219-230.
 - * 論說玄奘的所謂《表啓》中出現的長命婆羅門正是王玄策帶回的那羅邇娑婆寐，並加以說明玄奘在唐與印度外交中所起的作用。
- 2008 「內藤湖南の敦煌學」『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3． pp.19-36.
 - * 內藤湖南推動了初期敦煌學的成形，本文用最新資料具體證實其貢獻。
- 2008 Japanese Researchers of Russian Collections.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S St.Petersburg：Slavia. pp.176-187.
 - * 查證俄羅斯探險隊從新疆等地帶回的寫本與日本學者有著怎樣的關係。（英文）
- 2009 「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第117輯，平成21年． pp.1-19.
 - * 鄭其照於清末刊行出版了英漢詞典及眾多英語教材。本文圍繞其事蹟和著作，網羅式調查保存於美國的檔案資料及鄭氏著作，首次解明了其人真實形象及人生經歷。
- 2009 「ロシアの中央アジア探險隊所獲品と日本學者」『シルクロード文字を辿って——ロシア探險隊の文物』京都國立博物館． pp.25-31.
 - * 概觀奧登堡和科茲洛夫爲首的俄國探險隊帶回的文獻，並用檔案資料介紹與其日本學者的關係。
- 2009 「〔解説〕平定西域戰圖」『乾隆得勝圖平定西域戰圖』京都：臨川

書店. 18p.

- * 圍繞乾隆向法國訂製的西域戰圖銅版畫，解說其背景西域平定戰爭的經過，並更進一步使用新發現的資料，詳細論述銅版畫的構思、訂製、製作的各個階段以及銅版畫的下落。

2009 「漢字の西方波及」高田時雄（編）『漢字文化三千年』京都：臨川書店，平成21年. pp.255-275.

- * 追尋中亞及更西部還殘存多少用唐代以前的漢文書寫的碑文和寫本類，講述漢字向西方普及過程的歷史背景。

2009 〈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陳益源（編）《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縣文化局. pp.663-671.

- * 16世紀末用西班牙語解說的菲律賓華人使用 SANGLEY 語（閩南語的一種）詞彙集，解說其作者以及傳入的經過，嘗試將其定位為漢語方言史上的資料。（中文）

2009 「〔解說〕平定台灣戰圖」『乾隆得勝圖平定臺灣戰圖』京都：臨川書店. 16p.

- * 解說乾隆為紀念臺灣平定戰爭而下令製作的銅版畫及其歷史背景。

2009 〈敦煌的語言生活〉劉進寶（編）《百年敦煌學 歷史・現狀・趨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pp.320-325.

- * 陳述古代敦煌語言生活與其相關的基本問題，如多種語言的使用、方言與標準語言的關係、文字學習的實態等。（中文）

2010 「藏經音義の敦煌吐魯番本と高麗藏」『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4號. pp.1-13.

- * 展示玄應、慧苑、慧琳、可洪、希麟這幾種自唐至五代期間製作出的音義的敦煌吐魯番本面貌，指出這種音義的性質變化與藏經從寫本向刊經轉變這一過程是緊密相關的，同時指出高麗大藏經傳世留存這些音義上所發揮的作用。

2010 〈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發現〉《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期. pp.138-147.

- * 首先指出過去藏於柏林國立圖書館的宋刊本『周易集解』如今赫然保存於波蘭的克拉科夫這一事實，同時探尋了這冊書被帶入歐洲的經過以及大戰後的流轉。（中文）

2010 〈Khumdan 的對音〉《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pp.965-973.

- * 希臘語、敘利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粟特語等語言中表示“長安”的詞語 Khumdan 一直以來眾說不一，本文從音韻史學的觀點論證其原形由來於古代地名“咸陽”。(中文)
- 2010 「避諱と字音」『東方學報』京都85. pp.702-694.
 - * 舉出唐代時爲避高宗諱將“治”字讀作 li 音這一國諱之例，另有“裸”不讀“魯果反”而讀“胡瓦反”這一俗諱之例，論證避諱習慣對字音的影響。
- 2011 「李盛鐸舊藏寫本《驛程記》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
pp.1-13.
 - * 考證現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斷簡“驛程記”中的地名及內容，探討其爲歸義軍節度使向中原王朝派出的官方使節所作的旅程記錄，並在途中參謁了五臺山。
- 2011 〈中尊寺本金銀泥字《大唐西域記》的舊藏者——明治時期日本古籍流出的一例個案研究〉《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3期. pp.143-151.
 - * 中尊寺本金銀泥字《大唐西域記》首次爲人所知是於明治時期從高野山外流至民間，用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校訂。本文詳細考證了該經本收藏者松本初子，同時釐清了該寫卷的傳承，闡述明治時期古籍外流狀況。(中文)
- 2011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增入部分小考〉鄭阿財(等著)『佛教文獻與文學』高雄：佛光文化事業. pp.21-42.
 - * 明代以後的《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僧伽羅國〉條目中有鄭和率領攻擊錫蘭並俘獲該國國王「阿烈苦奈兒」這一事蹟，本文廣搜諸本，證明這一加入的內容初見於永樂南藏本。本文還舉出，與增加部份幾乎一致的文本亦出現在永樂時賜予第五世噶瑪巴的敕書中，同時考慮到永樂時期鄭和的事蹟，推斷增加部份出於鄭和自身的干預。(中文)
- 2011 〈平定西域戰圖解說〉譚皓(譯)《西域文史》第6輯. pp.301-313.
 - * 上述2009「〔解說〕平定西域戰圖」的中文增訂版。
- 2012 「新出の行瑠『內典隨函音疏』に關する小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6號. pp.1-12.
 - * 一直以來行瑠《內典隨函音疏》所知唯一現存例是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的卷三百七(守屋孝藏舊藏)，而近年北京的拍賣會上首次出現了卷二百六十四。本文根據現收藏者提供的照片，在解說新出現寫本的同時，論述《音疏》所依據的藏經，並論及日本所藏其餘諸本。
- 2012 〈俄藏利瑪竇《世界地圖》札記〉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說 李孝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北

京：中華書局，pp.593-604.

- * 利瑪竇萬曆30年版《世界地圖》現存者很少，本篇論文指出聖彼得堡的國立圖書館中藏有至今尚未為人所知的完本，並介紹其來歷。另外在對組合式木版的構造提出新的見解，並從木版的部份修補狀況推測諸本之間印刷年代的前後。(中文)

2012 「〔解說〕平定廓爾喀戰圖」『乾隆得勝圖平定廓爾喀戰圖』京都：臨川書店，pp.1-21.

- * 詳細解說描繪乾隆平定廓爾喀(尼泊爾)戰爭各種場面的銅版畫及其歷史背景。

2012 Qianlong Emperor's Copperplate Engravings of the "Conquest of Western Reg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70. pp.111-129.

- * 上述2009「〔解說〕平定西域戰圖」的英文增訂版。

2013 On the Emendation of the Datang Xiyuji during Gaozong's Reign: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Ancient Japanese Manuscripts. Imre Galambos (ed.) *Studi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 Budapest: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pp.49-58.

- * 通過比較宋代以後刊本大藏經的《大唐西域記》文本與日本古寫本文本，論述高宗時期進行了字句的系統性改變，但同時推測這種改變不可能太大，7世紀應該存有草稿本(繁本)和進呈本(定本)兩種《西域記》。(英文)

2013 La contribution de Paul Pelliot à la sinologie dans la perspective des savants japonais. *Paul Pelliot: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p.327-335.

- * 伯希和中亞探險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從日本學者與伯希和的最初接觸開始，陳述日本學者眼中的伯希和對漢學所作貢獻以及評價。(法文)

(以上收錄最新至2013年已出版部份的主要研究成果)

〔祝世潔 譯〕